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胡適 (1891~1962)

胡適，原名洪驊，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891年12月17日(清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上海。他的父親胡傳曾做過淞滬厘卡總巡和臺灣台東直隸州知州。胡適四歲喪父，由母親送他入鄉塾讀書。約在八歲時，偶然讀到《水滸傳》，從此對白話小說特別著迷。這給了他最初的白話文學的薰陶。

1904年，胡適離開績溪到上海入梅溪學堂，次年轉入澄衷學堂。他在這裡開始接觸到西方思想。嚴復譯的《天演論》，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成了他最喜歡的讀物。而梁啟超的論著尤其令他傾倒。

胡適在澄衷學堂就讀一年半，於1906年暑期考入中國公學。這個學校是上年留日學生為抗議日本文部省的所謂「取締規則」憤而歸國自辦的學校。學生中有一個組織叫做「競業學會」，骨幹分子多是革命黨人。會長鐘文恢恰與胡適同住一室。在他的邀請下，胡適為該會辦的《競業旬報》擔任撰稿，從第二十四期起又接任編輯。因而使他得到早期的文字訓練。

1908年夏秋間，中國公學為修改校章事發生激烈風潮，有數百名學生集體退學另外創辦起中國新公學。胡適在新公學裡擔任低年級的英文課。1909年秋冬，在各方調停之下，新公學復與舊公學合併，胡適不屑回舊公學去，開始自謀職業。

1910年夏天，胡適到北京考取了「庚款獎學金」留美。8月16日，他與同被錄取的學生共七十人從上海頓輪赴美。9月，進入美國綺色佳(今譯依薩卡)城的康奈爾大學讀農科。1912年初改學文科。從此，胡適對文、史、哲諸科均極用功，復以餘力積極參加校內外各項運動，講演尤為所好。他經常給當地報紙寫稿，曾在一次徵文中獲獎，受到當地輿論讚揚。其風頭之健，可見一斑。

1914年夏，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繼續留校研讀。次年9月始離開康奈爾前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跟杜威學哲學。杜威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胡適受其影響最大的是對哲學方法的高度重視。杜威對於有系統的思想過程的分析，使胡適對中國古典史學的考證方法有了嶄新的理解。此外，杜威的和平改革的政治哲學也成了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對胡適有終生影響的一個方面。但在哥大期間，胡適最為熱衷的，為其一生事業奠定基礎的，是文學革命的嘗試。

由於早年受過白話文學的薰陶，到美國之後又受到西方寫實主義文學的影響，胡適對中國文學史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凡屬優秀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白話的，或近於白話的。而那些古奧晦澀的作品卻大多是徒具文辭而缺乏真實的內容。由此他提出，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才是活文字。他主張，寫詩作文都應儘量用白話，使人明白易懂。在他看來，這正是文學革命的起手功夫。他的這些見解沒有獲得同學諸友的贊同，其中有個梅光迪更是激烈反對。但朋友們的反對沒有使胡適洩氣，相反，卻加速引發了他文學革命的自覺心，並逐漸形成有系統的主張。

當胡適在美國與朋友們辯論文學革命問題的時候，他的同鄉陳獨秀正在國內主編《青年》雜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向舊文化發起挑戰。陳獨秀曾多次托人向胡適邀稿。1916年8月21日，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他關於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陳獨秀覆信希望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雜誌。於是，胡適便以八項主張為綱，逐條發揮，作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於1917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青年》自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其八項主張是：（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方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文章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陳獨秀趁熱打鐵，緊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把胡適的溫和的學理式的主張變成激烈的革命宣言。於是震動全國的文學革命運動就此揭幕。

1917年5月，胡適交上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並進行了答辯。因主考導師們多對漢語、漢學很隔膜，致使論文未獲圓滿通過。胡適期之數年的博士學位未能到手，但由他「首舉義旗」的文學革命運動，這時在國內已如春潮澎湃。胡適感到，他的事業，他的未來，已經在向他招手，遂決計東裝回國。

7月，胡適回到國內，當即受到北京大學的聘請，在家小住月餘便北上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從此便與《新青年》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共事，並很快結識了北京的一派新人物，年高德劭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他們共同擁戴的長者。是年12月，回裡與江冬秀女士完婚，實踐了懸隔十四年的婚約，既安慰了寡母，又邀得社會輿論的普遍讚譽。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1918年初，《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輪流編輯。他們以此為陣地，復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將新文化運動迅速推向全國。胡適成了與陳獨秀齊名的領袖人物。

在文學革命運動中，鬥爭最集中、最激烈、最牽動社會注意力的是白話與文言之爭。白話文因其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廣大的社會階層中受到衷心的歡迎。反對文學革命的人，無力與白話文相匹敵。遂杜撰出一個堂皇的「理由」，聲稱，文學革命只應革其內容，不當革其形式。胡適回答他們說，文學形式的變革正是為文學內容的變革創造條件。「只有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1]胡適看到，要真正解決白話文學代替文言文學這個問題，必須成功地創造出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作品來。1918年4月，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鮮明地標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並系統地論述了創造國語的新文學的方法。此文被鄭振鐸詡之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2]。

胡適還大力提倡短篇小說和戲劇改革，並自己創作了一篇新式獨幕劇《終身大事》。但胡適對新文學的創造貢獻最大的是新詩的嘗試。1919年10月，他發表《談新詩》，文中提出關於新詩音韻的嶄新見解，打破了傳統成見，為新詩的成立提出了可靠的理論根據。著名新詩人朱自清說，胡適的《談新詩》「差不多成了新詩的創造與批評的金科玉律了」[3]。1920年3月，胡適的白話新詩集，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出版。文學史家陳炳堃評論說：「《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於建立新詩的軌範，不在與人以陶醉於其欣賞裡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4]《嘗試集》受到了包括從梁啟超到魯迅，知識界絕大多數稍具新思想的人們的歡迎，但卻遭到學衡派的激烈攻擊。反對派的攻擊沒有阻止新詩的發展。《嘗試集》不久即再版，而且跟著有一大批年輕的新詩人出現。胡適熱情撰文向世人評介他們的作品，孤獨的「嘗試者」有了戰友和夥伴。

胡適在文學革命的問題上，主要的缺點是「提倡有心，創造無力」，後來他竟認為中國當時還不具備創造新文學的條件。他過分低估了中國文學的價值，低估了新文學發展的巨大潛力。

在新文化運動中，最使廣大青年知識份子為之激動的是個性解放與思想自由。1918年6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月，胡適發表《易蔔生主義》一文，極力宣揚解放個性，發展個人才能的主張。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蔣夢麟、李大釗、高一涵等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徹底廢除一切破壞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及人身等項自由權的法律命令，切實保障人民基本的自由權。這些要求雖不能實現，終不失為一種正義的抗爭。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裡所鼓吹的「重新評定一切價值」的口號，是「五四」時期在思想原則上所表現的真正激進的態度。從這種態度出發，可以打破一切教條，可以根本改變人們對傳統道德、禮俗乃至政治、教育制度等等的看法。胡適對「孝」的傳統觀念的否定，對女子貞操問題的異議，以及關於女子解放、節制生育的鼓吹等等，都有推動思想解放運動的意義。

胡適還積極致力於教育改革。他就任北大教授的頭一年就創辦了哲學研究所，開創大學的研究風氣。他提議組織各科教授會管理教學，樹立教授治校的新風範。他倡議實行選科制，鼓勵青年學子的主動精神。他還參與創辦其他研究機構，鼓勵、贊助出版學術刊物，支持學生自辦文化學術團體等等。這些對於改造舊北大官僚子弟沿襲下來的惡劣風氣，推動青年學生的思想進取，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礎，都有不容抹殺的意義。此外，他對於全國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在內的新學制的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胡適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出版。這本書以其觀點和方法的新穎而引起學界的極大注意。他以哲學方法為中心線索，闡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演進。蔡元培指出此書有四大優點，即：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5]。此書出版兩個月即再版，以後又多次重版，足見它是深受歡迎的。它為胡適在學術上奠定了不拔之基。

胡適在學術上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領域是對於中國幾部古典小說的研究。他的《〈水滸傳〉考證》(1920年7月)啟發了年輕的歷史學家顧頡剛，以追跡古史傳說演變的方法，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開創了新史學的一個流派。胡適的另一篇《〈紅樓夢〉考證》(1921年11月)則第一次打破清末以來的種種附會的索隱派的迷霧，把《紅樓夢》的研究引導到正當的學術範圍內。在以後的七八年裡，胡適又相繼寫了十幾篇古小說考證的文字。經他考證和介紹的幾種小說，頗有躍登龍門之概，一時都成了暢銷書。而這些書的暢銷也有力地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的發展。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胡適對小說考證的興趣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標相聯繫的，這個目標就是整理國故。胡適認為，整理國故是創造新文化的一種必要工作。所謂國故，就是「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6]。

胡適在宣導整理國故時，提出疑古的口號。他鼓勵青年學者們以懷疑的態度去辯證古史。他主張「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7]。他這種懷疑與批判地對待歷史遺產的態度受到了復古派與國粹派的攻擊。

自從梁啟超歐遊歸國發表《歐遊心影錄》以後，守舊派又有抬頭之勢。1921年，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年，張君勱在清華發表《人生觀》的講演，兩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現出對西方文化的戒懼心理。胡適發表《評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梁氏的主觀主義與非歷史的態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東西文化的差別，最基本的是歷史發展程度的不同，中國將來也終必要走上「科學化與民治化」的路。胡適又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寫長篇序言，批評梁啟超與張君勱，認為他們的言論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開倒車。他的文章所採用的是實驗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難免有其局限性，但對於抵制思想界的復古逆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胡適是實驗主義(亦即實用主義)的忠實信徒。他自己從不諱言，他做學問、談政治，乃至做人做事，都是實行實驗主義。1919年春，胡適發表長篇論文介紹和發揮實驗主義，以後又多次在各地發表演講，加以鼓吹。在五四時期，實驗主義的客觀影響是比較複雜的。它的懷疑的傾向、大膽嘗試的精神、重視邏輯的思想方法等等，在當時是頗有積極意義的。但它否認客觀實在、否認真理的客觀性這種主觀唯心主義傾向則無疑地會發生某些負面影響。

胡適剛回國的時候，曾暗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力圖「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8]。但五四運動把尖銳的政治問題提到每個人的面前。胡適看到李大釗等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革命製造輿論;一大批青年憤激於軍閥專制，國家昏暗而醉心無政府主義。他「看不過了，忍不住了」，於1919年7月發表了他的「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中國的問題只能一個一個地解決，不可能憑藉某種主義一下子「根本解決」。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批評胡適，指出，問題與主義不能截然分開;而用主義來團結群眾向一個總目標做去，是改造國家的正確途徑。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實用主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義與馬克思主義、和平改革與暴力革命兩種根本對立的思想派別的初次交鋒。

1921年6月，胡適同其好友丁文江、蔣夢麟等組織了一個叫「努力會」的小團體。次年5月辦起《努力週報》。1922年5月13日，胡適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由蔡元培、李大釗等十六位大學教授署名，提出以「好政府」作為政治改革的起首目標，曾引起廣泛的討論。10月，胡適又發表《國際的中國》，指責中國共產黨的反帝綱領，聲稱，中國此刻沒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只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帝國主義的問題」[9]。

在《努力週報》上，胡適針對時局提出過許多改革的主張，對北洋政府的舉措也有一些很激烈的批評，但所有這些都是毫無效果的。1923年10月，《努力週報》停刊。

1925年1月，胡適出席段祺瑞的「善後會議」，遭到進步輿論的激烈批評。五卅運動爆發後，他曾與羅文幹聯名致信當時的外交總長沈瑞麟，提出兩步交涉的主張：第一步，先解決慘案本身，即懲凶、道歉、賠償等。第二步，修改八十年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他的意見沒有引起當局的重視，而他反對罷課的言論則受到進步學生的激烈批評。

1926年7月，胡適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會議。途經莫斯科時，參觀訪問了三天，對蘇俄產生頗為積極的印象。在英國停留半年，年底離英去美國。在那裡，他補領了被拖十年的博士學位，於1927年4月乘輪回國，並卜居上海。這年6月，他被推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機構，由中美雙方派員組成，簡稱中基會)的董事。從此，除短暫的間斷之外，胡適一直在這個董事會任職，這使他在教育學術文化界得以發揮很大的影響。8月，胡適受聘為私立光華大學教授。次年4月，受任中國公學校長。

胡適在歐期間，曾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卷子，得到一些禪宗史的材料，回國後便陸續整理研究，相繼寫成幾篇禪宗史的論文，並於1930年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

胡適由美回國時，恰逢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儘管胡適路過日本時作了擁護蔣的表示，但回國後，國民黨當局並不很信任他。1929年春，因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有人準備提出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所謂「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的問題，胡適以其嚴重蔑視法律與人權，遂接連寫了《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章，批評國民黨當局的專制。文中直接牽及孫中山與蔣介石，這引起當局的大不滿，特飭教育部對胡適發出警告；又組織國民黨人寫文章回擊，出版專輯《評胡適反黨義近著》；並在報刊上發表消息、宣言之類，大攻胡適。最後且下令查禁胡適的文章。

其實，胡適並不想與國民黨當局作對，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國民黨「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10]。

1930年11月下旬，胡適攜眷北上，重返北大任教，後來並擔任北大文學院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促成了胡適與國民黨當局之間的諒解與結合。那時，蔣介石集團的對日不抵抗政策正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政治上很被動。而在這個問題上，卻得到了胡適的充分理解與支持。1932年5月，胡適邀集友人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蔣廷黻等創辦《獨立評論》(週刊)，積極配合蔣介石的內外方針，宣揚對日妥協、對內「統一」。所以，《獨立評論》的創刊，是胡適在思想政治上與蔣介石集團靠近的一個重要標誌。次年2月，胡適與民權保障同盟的決裂，使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

原來，1932年底，宋慶齡、蔡元培等在上海發起成立帶有反蔣性質的民權保障同盟。胡適亦加入，並於1933年初創立北平分會，自任主席。2月初，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得同盟總部同意，發表了一份揭露北平反省院酷刑虐待的材料。胡適認為這個材料是偽造的，要求總部負責更正。總部當然不能同意。於是，胡適發表《民權的保障》一文，公開反對總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接著又對《字林西報》發表談話，繼續批評同盟總部的宗旨。宋慶齡不得不發電給胡適，請其「自由出會」。此事過後僅一個月，汪精衛就致信專誠邀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經過數日躊躇之後，胡適回答說：「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並表示願「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11]。

1933年6月，胡適赴加拿大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屆常會。10月回國，11月間，發生反蔣的「福建事變」。胡適發表文章批評事變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等「有危害國家的嫌疑」。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學生愛國運動，影響迅速推及全國。胡適表示有限度地同情學生的愛國行動，但反對罷課。他手擬《告北平各大學同學書》，指責學生罷課荒廢學業，滋生事端，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

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事變，提出反蔣抗日的口號。胡適致電李、白，指責他們是「掀動內戰，危害國家」。

這年7月，胡適再度出國赴美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常會，12月初回到國內。12日，西安事變爆發，胡適本其一貫擁蔣的立場，打電報給張學良說：「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指蔣介石——引者)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12]隨後，又發表《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成為國民黨當局的主要宣傳品。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大舉進攻中國。次日，胡適南下赴廬山參加蔣介石、汪精衛主持的談話會。會間曾與蔣、汪面談多次，仍主張做「最大的和平努力」。9月，受蔣介石之托，胡適以非官方身份赴歐美活動。

從1932年到1937年，胡適除在北大任教，主要精力用於編輯《獨立評論》。在這個刊物上，他共發表論文一百一十八篇(不包括《編輯後記》及遊記等文字)，其主要內容一是宣揚對日妥協，二是主張效法英美政制。此外還發表了幾篇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3月，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認為十教授的《宣言》「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時髦的表現」，是以折中論反對西化論。他主張中西文化應「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這顯然又同他宣佈贊成的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有矛盾。所以，不久他又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宣佈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而以「充分世界化」代替之。自然，這個提法仍不夠精準。

1936年11月間，《獨立評論》以文字觸犯宋哲元被勒令停刊。時胡適尚在國外。回國後，經一番活動並正式向宋哲元道歉後，於1937年4月復刊，至「七七」事變停刊。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叢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由於辦刊物和參與政治活動，這些年胡適的學術成績不佳。長篇著述完全沒有，稍可足述者只有幾篇論文。1934年5月寫成的《說儒》一文可算是這一時期胡適治學的代表作。文中對孔子及初期儒家的歷史地位做了較高的評價，受到郭沫若、江紹原等人的批評。

胡適於1937年9月到美國，1938年7月離美赴歐洲。不久，在蔣介石敦促下，決定出任駐美大使。9月離歐，10月初到華盛頓赴任，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任大使四年，至1942年9月8日卸任。以後繼續留居美國，曾斷續地在大學和圖書館擔任過工作。

1945年9月，抗戰結束，國民黨政府聘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次年胡適回國就任。1946年11月，胡適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召集的國民代表大會。12月24日夜，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國兵強姦，引起師生及各界極大憤慨。學生罷課示威，抗議美兵暴行，要求美軍撤出中國。12月30日，胡適趕回北平，在接見記者時，一方面表示理解學生、教授們的憤慨，同時卻強調「此次不幸事件為一法律問題」，力圖掩蓋美國對華侵略的政治問題[13]。

1947年初，蔣介石托傅斯年轉達，擬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2月6日，胡適寫信給傅斯年說，他「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因為只有處於在野的地位，才容易幫政府的忙，「替他說公平話」來支援他。若加入政府，便「完全不能有所作為」了[14]。

5月間，胡適邀同北大、清華等校一些教授組織「獨立時論社」，針對國內外重大問題各人撰寫文章交全國各地有關係的報紙發表。陸續入社的有四十多人，建立聯繫的報紙有三十八家。胡適以此在輿論上幫蔣介石的忙。8月下旬，胡適到南京籌備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曾面見蔣介石，向他提出發展教育的十年計畫。11月，胡適被推為久大鹽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12月中旬，為出席中基會的會議再到南京。蔣介石托王世傑勸他「改行」從政。胡適與王世傑長談多次，終於婉辭。

1948年3月下旬，胡適到南京出席中研院評議會會議，當選為第一屆院士。接著出席「國民大會」，選舉所謂「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其時，蔣介石為應付政治困境，曾敦勸胡適參加競選總統。胡曾略為所動，但國民黨內一些有影響的人持反對意見，事遂寢。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向前發展，國民黨的統治面臨徹底崩潰。胡適在北平電臺發表反共講演，然後又到武漢、杭州等地講演。他回到北平不久，人民解放軍就包圍了這座城市。12月15日，蔣介石派專機將胡適接到南京。

1949年4月，胡適受蔣介石之托，啟程赴美活動「美援」。在海輪上，他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為擬議創刊的《自由中國》雜誌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一篇是為將要出版的陳獨秀晚年論文與書信寫的序言。

1949年4月21日，胡適到達美國三藩市。兩天後，南京解放，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宣告垮臺。一年後他在給沈怡的信裡寫道：「這十幾年中，只有國際共產黨大致知道他們的目的與步驟；只有他們比較地明白他們所謂戰略與策略。此外，所謂大國領袖，所謂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15]他認為杜魯門、蔣介石們沒有想清楚他們要做什麼和該怎樣做，糊裡糊塗地輸給了共產黨。

1952年12月，胡適應邀回臺灣講學，次年1月17日離台去美。1954年2月，為參加所謂「國民代表大會」，胡適再度回台，4月5日復去美國。1955年12月，胡適著手撰寫《丁文江的傳記》，這是胡適一生所寫的四十多篇傳記性文字中最長的一篇。

1957年11月，胡適被任為中研院院長。次年4月，回台就任。1959年，又出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是年7月，他前往夏威夷大學參加第三次「東西方哲學會議」，發表《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講演。會後，他接受該大學頒贈的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得到的第三十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名譽博士學位。

1960年7月，為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赴美。在這次會議上，胡適發表《中國傳統與將來》的講演。大意說，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是「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這個核心是永不會消失的。他並宣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同這個核心是不能相容的。

1961年11月6日，在「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的開幕式上，胡適講演《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對傳統文化又有激烈的批評，引起不少人的反對。不久，以心臟病復發入台大醫院治療。1962年1月10日，胡適出院休養，但在2月24日中研院歡迎新院士的酒會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叢
書

歷史人物年表——胡適

上，心臟病再次猝發，不及救治而死。

作者：耿雲志

註腳：

- [1]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存》卷1，亞東圖書館1931年版，第279頁。
- [2]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頁。
- [3]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頁。
- [4]陳炳堃(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227頁。
- [5]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第2—3頁。
- [6]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4，第162頁。
- [7]胡適：《自述古史觀書》，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北京樸社192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3頁。
- [8]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3，第96頁。
- [9]《胡適文存》二集卷3，第128頁。
- [10]《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據手稿)。
-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08頁。
- [12]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45頁。
- [13]《申報》1946年12月31日。
- [14]《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第173頁。
- [15]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139頁。

撮錄：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